

## 萨尔茨堡的莫扎特

刘志康

一个每年更换的特展。莫扎特有两个儿子，都没有结婚，大儿子当了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公务员；小儿子弗朗兹成了职业音乐家，在父亲阴影下，成就不大。今年的特展就是关于他“谦逊的一生”的。

莫扎特的父亲里奥波特生了七个孩子，唯有莫扎特和一个姐姐生存下来。自 1747 年至 1773 年，他们一家在此居住了 26 年。随着他和姐姐的长大，居所更显逼仄；里奥波特就想摆脱这种“像士兵一样睡在一起”的状况。

1756 年 1 月 27 日，莫扎特出生在萨尔茨堡老城区的盖特莱德街 9 号，即现在在的莫扎特出生地博物馆。那是一栋米黄色的六层建筑，一面巨大的奥地利国旗从楼顶一直垂到二楼。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导游的带领下，一拨又一拨，络绎不绝；虽然有的只是在门口拍拍照、听听介绍，就一窝蜂地离去。近年来的欧洲之旅，使我有机会拜访了不下十几处音乐家的遗迹，尤其是刚去过的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故居，更是处处透露着一种矜持，从没见过像此地那样的热闹；也许，这正说明了莫扎特的深入人心。

这里基本保持着当年的民居格局。曲曲弯弯，顺着窄窄的楼梯往上走，依着标示的路线，就可以参观所有的房间。各种历史文献、莫扎特小时候用过的乐器、纪念物和莫扎特的肖像画等陈列其中；除了他姐夫画的《钢琴前的莫扎特》；还有一幅画描绘了莫扎特临终前的情景，颇为动人。尤其珍贵的是，这里还保留着他六岁时创作的乐谱和一缕金色的头发。四楼有一套三间相连的房子，临街为起居室，陈列着当时的家具，中间是卧室，后面是书房，当年莫扎特就诞生于此。往下走时，二楼有一个名为《剧院中的莫扎特》展览，用一些微型舞台模型展示了莫扎特歌剧的历史。一层还有

经过数年大学学习的磨砺，自觉在人文修养和重塑人生理想上，已有了不少进步。所以在老师泽方自感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尚能以理性之长驾驾驭某种乐思。写于考前前成于大三之长笛曲《Wie Mieng》就是这个例证。它令我从大二已浮躁颇为重重的竞争扭转里挣脱出来，激励我去如何清醒地面对自我和现实，从中寻出属于自己的路径泽方和方法。虽说已有这份自信，但对一个行将毕业的学生来说，面对未来还是多了几许惘惘和茫然。也就在此时似有某种神助，将命运之骰投掷于一个宽厚大度又富人格魅力的老人门下。

那是 1993 年 3 月初，在完成了一篇颇显优质的论文后，循得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使得我终于和心中敬仰的李德伦先生见面了。其缘由就是协助他去筹划在京某大报副刊上创设古典音乐的栏目。中旬一天，上午九时过后，带着某种欣喜和自己作品的录音磁带及论文小样，来到了李老师和在平和里离中央乐团不远的住处。未见面人，就已在他家窗前不远处听到了他与人说话朗朗声。进屋甫一见面，彼此就觉得很熟。不用寒暄，也没有一丝拘谨，就像已经相识许久的老朋友那样聊上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先主动吩咐工作，而是随意地讲了他正在忙的话。他和他正关注和筹划国际指挥比赛，还有就是他觉得时下国内演出市场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的票价差距太大，正张罗着向有关方面反映，呼吁古典音乐票价也应有五百元一张的高价票等。我除了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向李老汇报了哪些诸如音乐美学与音乐表演关系、世界指挥流派的不同风格之比较的个人认识外，还讲了指挥与书法的某种连接及同台表演的设计。李老饶有兴致地听着，得知我是某种指挥方面的积累，尤知我的视唱练耳功底考是在戴克炎先生专业课上通过的，其中自弹自唱法国教程获得高分。他微微地点头称许，而不过问太多细节。

话题说到了我毕业留京之事。当他得知遇到很大困难后，就示意停一下，随即拨通了文化部教育司司长电话，一边介绍我的情况，一边向对方说：“他正协助我做一些音乐分析的工作，目前国内很需要乐评方面的人才。”他电话那头说主要是已过了报名名额的最后申报日。我见想补救说明，他用左手向我轻轻地摆了摆，一边又向对方争取着。当他确知过了申报日后，便让我找出血和纸来。说罢，就向北京市教委大学分配处领导写了推荐信，信中最后留留我在京工作是合适的。落款后又说“趕緊到那里再争取一下……”在李老力的荐下，留京之事最终还是有了着落。这为我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到了午饭时间，听说我是南方人，李老特意叫人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海带丝。饭时，他的邻居、著名作曲家罗希贤老师像往常那样来到他家唠嗑，李老还向瞿先生介绍了我。那顿便饭，令我至今难忘的还是那碗口感颇佳的海带土豆粉丝汤。饭后，李老有年休的还是那碗口感颇佳的天津炸麻花。我开玩笑说：“李老，我想准备一台音乐会。”“谁的作品？”“见多芬。”“第五。”“第五。”“如他所言，一定会觉得其中有些荒唐，甚至异想天开了。然而，他神情依旧入定平和，关心地问我：“钱哪儿来？”“有了钱再说。”聊到贝多芬作品的精神，他说：“《贝7》不是好听了。”说着就唱起了《贝7》开始的带有谐趣性的节奏。说：“这个附点节拍乐队很难演奏。”接着，看了我写的撰稿词，不时地对一些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曲式结构等进行发问。他眼神

敏锐，有一丝含糊都难以躲过。转眼，到了 5 月 17 日左右，我如约去他府上。刚入门就听保姆说李老正在会客。只听屋内传来了李老低沉又富磁性的声音：“让他进来。”我有些忐忑进入他的会客厅。他见我正一住刚获国际大奖的台湾年轻指挥谈着。李老示意我入座于年轻指挥家夫妇的对面，旁有乐团陪同人员。李老对我说：“自报姓名。”随后向客人介绍了我的情况。他还向客人介绍了乐团的运作等，与客人道别时，他和夫人李珏坚持让我与他们一起并肩站在门前送客。那天是这位年轻指挥家与中央乐团排练之余，作为首访祖国大陆的贵宾，特意前来拜访李老的。如此重要的场合，我一般都应回避。然而，李老却让这个普通大大学生不仅参与其中，还与他们一道送别客人。李老这件事情的大度、善待后生小辈的襟怀，令我想起电视连续剧《海棠依旧》中的周恩来。

我随后送上撰稿词。李老阅后显然较满意，顺便就说起有关 CD 包装美术摄影版权署名等细节。只见李老倚在近两米多高的大书柜前，喃喃地说：“嘛，名字是一个符号，我李德伦名字都很封建。”他的这番自我调侃式的幽默，难掩其处世善从大处着眼，原则下灵活变通的风格特点。也让我从中学到他的为人处事之道。

1998 年 10 月，我有幸参加一个国际音乐节。恰逢中秋之际，临走前我决心向他汇报一下。他问我最近是否还在创作等，我这就向他吐露了埋于心头的隐衷。家事繁多，一直在尽心照顾家中的父亲，他略为问了一些细节，神情有些凝重。临别时，他执意要送我一盒月饼，说：“给你父亲，并替我问候他们。”病危中的父亲腹痛发作时，时常拿着这盒月饼复念叨着多谢李老，并将空盒留在枕边许久……李老对普通子女的这些关切是那样的贴心入微，不仅抚慰了病痛中父亲的心灵，也缓解了家中的一些矛盾。

2000 年 7 月，上海图书馆邀我举行一个讲座，但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权威为此题辞。我即与他联系，将信函和讲座内容附件寄给他。那回，李老身体已很虚弱，得知讲座的意义，还是寄来了他的亲笔贺辞：“祝上海图书馆讲座成功。”并留下他那粗犷简洁的篆文名字的印章。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题辞了。从这个简约的题辞中颇能感到也许对他上海这座国际现代城市化大发展的真切期望和美好的祝愿。

李老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牵挂最多的仍然是中国交响乐事业如何能发展得更快更好。为此，多年来他奔波于大学、机关等不同场合，做着李氏独有的幽默风趣式的讲座。在他的精神引领和感召下，多少年轻学子从此走上了热爱古典音乐之路。他尤其重视交响乐的普及工作和指挥人才的扶持培养，给予那些与他一起工作中的中青年指挥家真诚的帮助。比如那个文化部独有的“汤氏模式”等都靠他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的影子。他那超然于小我之上的伯乐情怀，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一些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而我作为一个幸运儿为能在他的鼓舞下，目睹他的音乐演绎之风和为人处事之道而感到由衷的敬佩和自豪。

在李老百岁生日之际，仅以此拙文来表达我对他的崇拜和敬重之情，和他那愿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甘做人梯默默奉献的情怀。深信所有这一切都会激励我们这些曾在他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后生小辈和年轻学子，继续行远在他那富有深远文化洞悉力和感召力的音乐人生篇章里，从而不断沿着他的精神轨迹去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和发展添砖加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李老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牵挂最多的仍然是中国交响乐事业如何能发展得更快更好。为此，多年来他奔波于大学、机关等不同场合，做着李氏独有的幽默风趣式的讲座。在他的精神引领和感召下，多少年轻学子从此走上了热爱古典音乐之路。他尤其重视交响乐的普及工作和指挥人才的扶持培养，给予那些与他一起工作中的中青年指挥家真诚的帮助。比如那个文化部独有的“汤氏模式”等都靠他身体力行和以身作则的影子。他那超然于小我之上的伯乐情怀，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一些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而我作为一个幸运儿为能在他的鼓舞下，目睹他的音乐演绎之风和为人处事之道而感到由衷的敬佩和自豪。

在李老百岁生日之际，仅以此拙文来表达我对他的崇拜和敬重之情，和他那愿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甘做人梯默默奉献的情怀。深信所有这一切都会激励我们这些曾在他精神引领下成长起来的后生小辈和年轻学子，继续行远在他那富有深远文化洞悉力和感召力的音乐人生篇章里，从而不断沿着他的精神轨迹去为中国交响乐事业和发展添砖加瓦，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报执行主编 曹畏**

# 上海音讯

## 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

2017年9月25日 第3期(总第81期) 上海音协网址:www.shmusic.org

上海市连续性内参资料准印证(B)第0048号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编者按

去年9月中旬前夕,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一行应邀前往俄罗斯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参加“柴院”成立150周年庆典活动。 预知“柴院”将为此间创作和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的教投出版纪念专集，其中包括1955年至1960年朱践耳先生在留学时的主讲老师谢·阿·巴拉萨良教授。朱践耳先生当年留学时，是“柴院”里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得到过巴拉萨良教授的赞扬。此次“柴院”为巴拉萨良编印专集，很希冀朱践耳先生为老师写一篇纪念文章，并委托上音代约为稿。

巴年过九旬的朱先生立即欣然接受，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同为留苏同学、音乐理论家黄晓和来家，亲自口授，由黄晓和教授执笔写成《亲爱的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一文，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和缅怀之情。今本报特发表这篇可能是朱先生最后的遗作，对于今年8月15日长逝的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我们三位中国作曲家——瞿维、邹鲁和我，1955 年被国家派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由于到达晚了，学院作曲系老师的学生已经离岗。因此学院专门从外面聘请谢尔盖·阿利捷米耶维奇·巴拉萨良做我们的主科教师。巴拉萨良本人也是莫斯科音乐学院培养的优秀人才，是一位在创作和教学上成就突出的学者，我们能成为他的学生，感到十分荣幸。

在跟他他学习五年的过程中，在他严格而亲切的教导下，我进步迅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从一名只会写作简单歌曲和乐曲的业余作者成长为一名能写作复杂的多声部大型作品——交响曲与大合唱的职业作曲家。我对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第一年(1955)从民歌改编、艺术歌曲和简单器乐曲入手，进行写作。这期间老师对我写的钢琴序曲《告诉你……》比较喜欢，他认为这首乐曲不是改编，也不是模仿，而是独立的创作，有真挚的情感。他的话使我懂得了艺术贵在创新。第二年(1956)写作弦乐四重奏和无伴奏合唱。第二年(1957)写钢琴独奏曲、小提琴与钢琴曲和管弦乐作品，其中最成功的是管弦乐《节日序曲》，我在配器中用小号模仿中国民间吹奏乐器唢呐，老师认为有独创性，表示称赞，并推荐给电台播放。第四年(1958)写了交响诗《祖国颂》和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前三个乐章。第五年(1959)续写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的后两个乐章。对我的这部毕业论文，他非常满意，然而老师要求严格，他认为作品是中国革命题材，并且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一定要征求中国音乐界领导和专家的意见和得到认可，才能算数。事后确实通过中国音乐专家的肯定，并于1962年在上海首演，获得好评。后来从中国中央电台国际部特别制作了一小时的录音节目(45分钟中国音乐录音，10多分钟我用俄语的讲话)，送往莫斯科，于中国国庆日10月1日在全苏广播，老师和好朋友们都听到，事后老师亲笔给我写信，表示称赞和祝贺，令我万分感动。

总结老师的教学，有以下几点，我记忆深刻：第一，他要求我们作曲时，要有明确的目标、选择有意义题材，要有明确的目的；其次，写作必须要发自内心的、有感而发，充满感情和想象力；第三，音乐要运用民族的音乐语言，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第四，一定要充分利用和创造性地发挥专业的写作技巧。我一生的创作和教学，都遵循了老师的教导，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时光似箭，自那时到如今，已经过去有半个多世纪，老师早就在天堂安息，而我已进入 95 岁高龄。岁月难忘，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

2016年9月中秋时节  
(朱践耳口述，黄晓和执笔)

本报讯 2017年8月15日上午9时，我国著名的作曲大师、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尊荣的师长和忘年交朱践耳先生因病逝世，享年 95 岁。噩耗传出后，立即在音乐界人士和爱好者及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哀悼朱老的逝世。朱老曾向夫人舒群老师关照，他的身后“不开追悼会以及任何形式追思会”，“遗体捐献医学院”。

朱老生前与世无争，全心全意埋首交响乐的创作，毫无名利地追求，只留清白在人间，只留他那个乐的举不胜数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在人间。他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党员作曲家，总是以内省的旺盛激情和不倦的探索精神，无私地致力于我国交响乐的创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开拓性的成就。尽管他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在临终之后，仍然不愿惊动社会，而是采取悄悄远行的方式永别世人。

对于朱老这样一位为我国音乐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曲

## 亲爱的老师永远活在我心中

朱践耳



## 深切悼念音乐大师——朱践耳

陆在易

2017年8月15日上午九时，一个杰出生命的历史就定格在这一刻——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中国老一辈作曲大师朱践耳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除了不知为何总是合不拢的嘴，他的脸仍是那样地平静、温和，一如他生前惯有的慈祥、亲切模样。

过了约不到一小时，全国音乐界及音乐爱好者们的手机瞬间几乎全被他去世的消息刷屏了，起码在我手机的朋友圈中，百分之九十几的帖子均是：“泪别朱践耳”、“缅怀践耳先生”、“向大师致敬”等文章，由此，即可见朱践耳先生在全国音乐界及音乐爱好者心中有多大的份量 and 影响力！人们是多么地敬重、爱戴朱践耳！尽管都知道朱先生近两年健康欠佳，且已是 95 岁高龄，但对他的离世，还是止不住内心万分痛楚！

我与朱先生相识、交往已长达四十余年。与他的年龄、资历、学识、巨大成就相比，我简直是他的“小小老弟”。但由于相识久了，别人都无一例外地称他为先生，我却总是“朱老，朱老”地叫，他当然亲切地称我为“在易”，这大约即是一种人们所说的忘年交吧！

在跟他耳生命历史定格后的今天，我感到自己胸中涌现出从未有过的强烈愿望，即想把装在我脑子里的，永远记住朱践耳的、大概也才专注于朱践耳的“东西”写出来，以与音乐界及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和“朱迷”们交流，同时，也告慰我亲爱的“朱老”。

(一)

首先，他是一位罕见的“天才”，这样的“天才”，我敢断言，多少年才会出现一个。早在 他 1940-1945 年在家卧病期间，仅凭着感觉和悟性，便先后写下了《艺术歌曲七首》，而这些艺术歌曲，即使现在听来也还具有相当水准。1955 年，他有幸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他原本所具有的悟性和才思顿时就像闸门一样被打开了，写下了数量可观的作品，尤其是从四年级下学期起至五年级下的结业之作交响曲——大合唱《Symphony—Cantata》《英雄的诗篇》，成为中国交响大合唱这一体裁的开山之作。我有幸聆听过 1962 年它在“上海之夜”音乐节上的首演，不同凡响的和声、旋律、节奏、织体编织成一股巨大的、并充满变幻的音流，冲击并震撼着全场每一位听众。以上所举仅是朱践耳整个创作生涯的前期作品，远不指高峰期，但却已明显体现出他所具有的天才的创造力，与中国同期作曲家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论，都已在最前列，这是确实无疑的。

(二)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朱践耳在 64 岁才完成第一部交响曲(我没有做过调查，这在中外音乐史上若不是绝无仅有也应是极少见的吧?)，据我所知，写得异常艰苦，他多次和我谈过，是因为写错了，也因为他要“摆脱旧的理念与习惯性技法的束缚”。尔后，约年年一部，甚至两部，而且每部的样式、内容、风格、技法都在改变，连续创作了十部，加上未列入“第九”的小交响曲，共计十一部。在这里，我不打算对以上作品逐一进行评述(那是音乐学家的事)，我主要是想强调指出，朱践耳创作生涯中最难得、最可贵之精神——，显然是晚年(这里所指晚年若从 50 岁算起竟长达 40 余年)所具有的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甚至不可能达到的奇妙的勤奋、忘我的拼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这是迎来和形成朱践耳创作高峰期(我认为这一高峰期，也亦转型期是自完成《第一交响曲》算起)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认为他是我我国的一位音乐巨人。别看他斯文、文质彬彬，内心却有坚强的定力，他有着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典型品德和人格。

我坚信，中国音乐史上将永远会留下朱践耳的英名，中国的爱好者将永远会记住朱践耳这个名字。朱践耳先生的精神不朽！（此文为特约专著《中国的音乐巨人——朱践耳》的简编版）

当日上午尚有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著名唢呐演奏家刘英前往看望舒群老师，悼念朱先生不幸逝世。刘英是朱老作曲和献曲协奏曲《天乐》的首演者和多次演奏者。朱老在创作此曲



## 深切悼念音乐大师——朱践耳

陆在易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他经常通电话，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在电话中他曾对我说：“在易啊！晚上 11:30 之前你尽可以来电话。”这就意味着，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 11:30 之后。而那时的他，已是年余 80 岁的人了！多么地不易！我还记得，第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2003 年)“终身荣誉勋章”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获奖的桑桐先生、朱践耳先生都发表了由衷的感言，朱践耳的话语尤为感人。他说：“我很惭愧，我没有多少成绩，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还债，努力向人还债！”(大意)或许有人会不懂他的意思，但我很理解，他说这番话的真实意思是：浪费掉的时间太多了(指“文革”)，我只有抓紧时间写作，才有可能对得起抚育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

也许是深受他精神之感动，我曾在 2006 年 10 月 在《朱践耳管弦乐曲集》首发式上动情地说过一段话，与本文直接有关，不妨抄录于下：

“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执著；有一个名字，象征着与时间和生命赛跑时的顽强毅力；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永远的好学和不倦的追求；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才华、革新和创造力；有一个名字，象征着音乐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深层思考；有一个名字，象征着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献给了我们的音乐创作事业，这个名字，就是姓朱，名践耳，朱践耳！朱践耳先生！”

据了解，《朱践耳交响曲集》的重量为四公斤(合八市斤)，《管弦乐曲集》的重量为九斤二两，加上后来出版的《朱践耳作品集》，这当然是指乐谱的重量，若对发展我国的交响音乐事业而言，这几本《曲集》的份量你说该有多么重！

(三)

中国能出现朱践耳，这是中国音乐界的幸运。而他近七十年的创作生涯，迄今为止，至少在中国也是难以被打破的时光记录。

他所涉猎的创作体裁除歌剧外，几乎音乐创作领域内的大多体裁，包括交响曲、管弦乐、室内乐、民族器乐、交响大合唱、合唱、舞剧音乐、钢琴音乐、器乐创作、重奏、歌曲等，均有佳作或经典乐作，如此巨大的创作成就，有几人能与之比肩？

特别难得的是，他处世低调、处事谦虚，从不自负，更不骄傲。他经常主动走到爱好者群中征求对自己作品的意见，爱好者们即他的贴心朋友。他甚至会为《纳西一奇》这一当时的新作专程跑到云南丽江纳西族中听取意见，纳西人给了他最高的评价：这是纳西人自己的交响乐！

他对创作的极度认真，对管弦乐表现性能的钻研无人能及。“上交”原首席张曦文曾满怀崇敬地说：“单说他对小提琴泛音之了解，研究竟比我还深！”

他是作曲家，同时又是思想者。

他有着深厚的传统音乐根基，又能与近代、现代的作曲技法融会贯通。

因此，我认为他是我我国的一位音乐巨人。别看他斯文、文质彬彬，内心却有坚强的定力，他有着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典型品德和人格。

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与朱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朱老的逝世异常悲痛。当日上午 10 时 40 分，协会常务副会长曹文炳等五人代表协会会员赶往朱老家中，在朱老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并向舒群老师表达了向师长、哀悼和珍重的意愿。协会的五位代表与舒群老师回忆了朱老与协会的多次交往，回忆了协会从朱老先生为人和音乐与创作获得的许多教益。协会和朱老及夫人舒群老师为在十年中结下了忘年之交的深情厚谊在乐坛传为佳话。协会永远不会忘记朱老音乐创作的辉煌业绩和崇高品德，永远不会忘记朱老对协会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和殷切教诲！

(下转第 2 版)



## 双雄合璧

海捷

今年秋季，世界乐坛如雷贯耳的双雄：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将先后光临东方艺术中心，这无疑是上海演出史上的盛事，广大乐迷无不翘首以盼！

之前，这两个乐团都曾来过上海，回忆当时现场聆听的情景，历历在目，温馨亲切。

先说维也纳爱乐乐团。2004年2月，小泽征尔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次访沪，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两场音乐会。当时，这是轰动性的新闻。我欣赏了第一场演出，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聆听维也纳爱乐。也是我第一次现场欣赏小泽征尔的指挥艺术。曲目有：舒伯特《第八交响曲》、理查·斯特劳斯《唐璜》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现场聆听的感觉就像海绵吸水，生怕漏掉一丝一毫，第一次领略了维也纳爱乐金光灿灿的音响色彩。

说维也纳爱乐，就要说柏林爱乐了。2005年11月，西蒙·拉特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造访东方艺术中心（演出两场），轰动申城，连平时不太听古典音乐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就是以前“指挥皇帝”卡拉扬的乐团。我欣赏了第一场，在演出前还观摩了乐队排练。曲目有：柏辽兹交响序曲《海盗》、拉威尔《鹅妈妈组曲》、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柏林爱乐精致干练、音色丰满、诠释深刻、气势磅礴，是纯正歌剧，乐队的编制比较大，但味道较窄。我的座位离舞台比较近，体验细节的感觉更加鲜明，对维也纳爱乐独到的细腻优雅印象深刻。

2009年9月27日，由祖宾·梅塔率领的维也纳爱乐第三次来到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一场音乐会。我的门票早已落定。但在临演前夜，东方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嘉宾去直播室，参加当晚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0周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庆典音乐会节目直播。分身无术，只得忍痛割爱，与当天的维也纳爱乐失之交臂。
我的座位离舞台比较近，体验细节的感觉更加鲜明，对维也纳爱乐独到的细腻优雅印象深刻。

2009年9月27日，由祖宾·梅塔率领的维也纳爱乐第三次来到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一场音乐会。我的门票早已落定。但在临演前夜，东方电视台邀请我作为嘉宾去直播室，参加当晚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30周年在上海大剧院的庆典音乐会节目直播。分身无术，只得忍痛割爱，与当天的维也纳爱乐失之交臂。
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建成后，作为开幕演出的重大大戏，于2014年9月18日邀请维也纳爱乐登台庆祝，由乐坛当红明星杜达梅尔指挥。演出前，我观摩了乐队排练。音乐会曲目有：莫扎特《交响协奏曲》(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和长笛首席担任独奏)、西贝柳斯交响诗《图内拉的天鹅》和《第二交响曲》。

日前，媒体上对当前的稿费问题颇有议论。想想也是，作者绞尽脑汁，好不容易写成一篇文章大，大部分是石沉大海，即使发表了也只有微薄的稿费，难以体现文化的价值。

有人说，上个世纪60年代稿费不低，有的靠写作可以买一幢房子，有的靠稿费谋生，不拿国家一分工资。这倒是事实。记得我在1964年写过一首短诗，只有八句，发表后所得稿费是7元。那时我的月工资50元，也就是说，一首短诗的稿费相当于月工资的七分之一。现在一般员工的工资在5000元左右，按这个比例推算，当时这第八句短诗现在稿费应该在700多元，现在有何？想也不敢想。

话又说回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现在办报杂志也不容易，纸质刊物的日子并不好过。退居前在一家刊物工作，刊物难办我是亲身经历的。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要大幅度提高稿费，这不是奢望吗？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心也能够平了。

其实，稿费低些并不是目前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谨防文化陷阱。近年来，有些所谓“文化单位”，以各种名义，设下陷阱，诱你上钩，在他步步诱导下，你不但拿不到一分稿费，反而

## 上海音讯

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都有各自不同信仰，不同的风俗民情。人们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就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而尊重与理解就需要交流。说到交流有多种形式，有物质的，如货物、产品等；也有非物质的，如精神层面上的因素，如文字、伦理、民俗、音乐、美术、舞蹈等。通过各方面的交流沟通，人们就可以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消除隔阂、增进信任的目的。

由于各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语言、地域、地理、民族、风俗以及宗教信仰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信仰，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这种不同需要交流才能达到信任和合作，进而增进友谊、达到和谐。民歌是最自然，最本真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性格的一种人文艺术。不同音阶、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民歌汇集成形成了各自民族、国家的形象，将世界各国的民歌集中呈现，可以形成一个色彩斑斓，繁华似锦的大花环，通过民歌可以看到世界民族这个大家庭。通过民歌的交流鉴赏，对他国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民族信仰就可以有相应地了解。通过传唱和赏析民歌是一种人们相互了解、互相交流是自然而便捷的真实过程。

它的民歌也是一种世界人民的语言，如加拿大的《红河谷》与美国的《雷兰多》，对这两个建国历史不长的国家来说，这两首民歌具有悠长的历史记忆了。两首民歌都反映出这两国人民在开发初期的人文情感，希望不甘充满了伤感，既希望有美好的未来，又不忍与心爱的女人暂时分离，旋律优美绵长，又有感伤。

英伦民歌《伦敦德里小调》与《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则带有明显的英国气候特点：阴湿、雨雾，能见度较低。整个作品有着忧郁、舒缓、哀伤的气氛，但歌曲的情调却是真挚的。听英国民歌时，对这个国家的气候因素也是要顾及的。另外，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之间还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听多了她们的民歌亦可区分。英国的民歌资源很丰富。

前苏联（包括俄罗斯与加盟共和国）也是民歌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其旋律粗犷真挚，优美辽阔，反映了生活在北方广袤原野上的人们生活性格。民歌《伏尔加船夫歌》充分展示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顽强信念，其旋律如浓烈烈的伏特加，具有深沉的力量。在高加索南麓的格鲁吉亚，有首《苏丽珂》的民歌，是情人发自内心真挚的歌声，凄凉的旋律拨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又给人们带来无穷美好的联想。《苏丽珂》竟然成了格鲁吉亚国家名片。

中东与北非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的民歌有着浓郁的伊斯兰风情，表演起来经常载歌载舞，具有诙谐、幽默感，颇有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的神韵。如黎巴嫩民歌《黑眼睛》与埃及民歌《尼罗河畔》。除此之外中东民歌还带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与气候特点：沙漠、干燥

## 阳光灿烂的江湾生活——祝贺上海音乐学院成立90周年

林亚荣

我19岁就进了上海音乐学院，至今已有65年了。虽然期间在北京俄青、莫斯科柴院6年，在上海芭蕾舞乐队工作7年，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上音人”。
其实我在上音只读了一年，但在这一年发生的事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52年我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来到位于江湾的上海音乐学院（时称“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管弦系学习，那是国庆三年后后阳光灿烂的一天。上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校园好大呀”！一座高大的三层教学主楼，两边是较矮的两层楼的男、女生宿舍。紧挨着它们的是红砖砌成的带走廊的十几间琴房，像伸出的手臂围着主楼前面的一个大操场。校园周边是绿油油的农田，远离市区人的喧闹，让人心旷神怡。当时是绿杨院长主持工作。不久，听说我就是真正的一年级学生，而我班的一年级同学已是第二年在在这儿学习了。原来因为解放初期有许多运动大家都要参加，特别是1951年在全国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上音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学校一直没能正规上课，如同关门。1952年开学前，贺院长向文化部反映了这个情况，强烈要求全校学生留级一年，理由是：没有本事怎么为人民服务！啊！这种事全世界恐怕都不会有的！他的魄力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他的勇于担当及对青年学生的负责精神使我对他深感敬佩！

贺院长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音乐和曲艺，每天同学们做完早操都要先拉小提琴一起唱民歌，然后才吃早饭，学校还专门请了两位民间艺人给声乐系学生上课。记得那时上海正举行华东戏曲汇演，学校特地租了专车，一次就把我们、豫剧常香玉、黄梅戏凤英等戏曲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印象特别深刻的京剧蓝芳大师演的《白蛇传》，白素贞那种美丽善良、既温柔又坚强的性格，都在蓝大师一招一式表演中体现出来，真是让人终生难忘！

1952年是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我开始了正规的大提琴专业学习。我还有一把旧用的大提琴，那是谭抒真副院长创办的“乐器制作室”送来的（在育才我们的琴和谱子都是合用的）。那天通知我到校门口去拿琴时，我非常高兴，一

与炎热；长袍，面纱与骆驼。

印度尼西亚地处南亚，气候湿热多雨，由于靠近赤道天气炎热。她是民歌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度。《梭罗河》《哎哟妈妈》《宝贝》等印尼民歌，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虽然它也是伊斯兰国家，也有与中东一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也谈谐幽默，如《哎哟妈妈》，但气候炎热湿润，也使旋律产生出不同于中东的缠绵悠长。《宝贝》反映了深沉的母爱，在悠长的旋律中，令人感知温暖真切，实际上它是一首摇篮曲，长怀感激之情的旋律，仿佛永远不会消失，使人们永远敬爱伟大的母亲。

中国国土辽阔，相当于欧洲的面积，而且地形复杂多变，气候多样。中国有57个民族，每个民族又都有自身特点。国土疆域辽阔，东南西北跨度甚大，各区域的民族、语言、风俗、人文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仅地域形态就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丘陵、平原之分。因此中国各地的民歌十分丰富，千姿百态，是民歌资源的宝库。各地民歌反映的各个民族的生活状态，又因气候不同而不同。

内蒙民歌《辽阔的草原》《天上的云》反映的是蒙族人的真挚粗犷的性格，是面对大草原的坦荡。内蒙民歌旋律平实、悠长，如同草原漫长绵延，歌词像天空中的白云与草原上的羊群，延伸着草原的壮美，折射出其微妙的变化。《辽阔的草原》表现了内蒙地域的自然风光，辽阔而美丽。（《天上的云》描写了草原广阔的空间与牧民的胸怀，而对大自然，人们既感到自然的壮美，又无法永恒地拥有它，于是对此发出了感叹与无奈。壮美和苍凉是内蒙民歌的特点。

杭嘉湖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俗称江南地区，那里水网密布，河道蜿蜒，风光秀丽，是中国富庶地区。江南民歌旋律委婉、秀美，受苏州评弹的影响，唱词并不多，托腔拖拍，常常有一唱三叹之妙，如《江南好》《小九连环》《茉莉花》等均有此风格。江南的语言，常常被称作吴侬软语，这种语言是江南民歌演唱的基础。

如把内蒙民歌与江南民歌对比，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是由于地域不同所形成的。类似情况还很多，如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带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载歌载舞。而东南山地的《采茶扑蝶》采用温文尔雅的小歌舞形式，歌曲律如同玩耍。两者各自个性鲜明。我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歌资源无比丰富，是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进行交流、友好往来的坚实桥梁。

纵观中外，民歌如汪洋大海，美不胜收。各种风格、腔调，别具一格。梳理各国民歌，虽千差万别，一样却相同，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爱”，用“爱”字建立相互了解，相互了解，达到和诣与友谊的目的。欣赏中外民歌时，再配上中外地图对照可能更有意思。世界是大家庭，民歌是世界性语言，它诉说着全人类共同的语言“爱”，让“爱”笼罩全球吧。

### 2017年9月25日

今年8月15日上午九时在上海瑞金医院上海音乐厅，乃至全国音乐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国的一颗音乐巨星陨落了——成就卓著、名闻遐迩的作曲家朱践耳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逝,享年95岁。噩耗传出，在音乐界人士和爱好者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和极大的震动，也使旋律产生出不同于中东的缠绵悠长。《宝贝》反映了深沉的母爱，在悠长的旋律中，令人感知温暖真切，实际上它是一首摇篮曲，长怀感激之情的旋律，仿佛永远不会消失，使人们永远敬爱伟大的母亲。

说起朱践耳，人们自然也就想到了他的1965年创作的两首响彻全国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原名《雷锋的歌》)和《接过雷锋的枪》。毛泽东同志于当年3月5日向全国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朱践耳这两首歌曲接连创作出来后，分别于同年2月21日和3月1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可以说朱践耳这两首艺术性很强的群众歌曲,为毛泽东同志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起了舆论先导的宣传作用,这两首歌曲即传遍大江南北,如同奔腾不息的波涛激浪在亿万军民的心里，也给朱践耳在全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知名度。

然而朱践耳的创作成就绝不仅限于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更突出、最辉煌、最卓越的创作成就,是在他的交响曲及各种音乐作品体裁的大量创作中。

朱践耳少年立志，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后，他就决心弃理从文,“一心要当音乐家”。他学拉手风琴，学吹口琴，学弹钢琴，甚至还拉过钢琴，树立了终身走音乐道路的宏愿。他原名朱荣棠，字朴臣。13岁时他就“被聂耳”作的电影歌曲强烈地吸引着”，后来他更多地了解“聂耳”，“非常钦佩他的远见和志向”，于是他把自己的字朴臣，以至为理，以后这个早年被他改的字竟然成了他的正式名字，以现在响彻神州大地、欢誉海外。朱践耳在他著写的《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一书中说到他改名的初衷，他说：“其中的‘践’字,含义有二,一是决心步履其后之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也要去苏联留学,也要写交响乐。”那时他就在心中为日后的“交响梦”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此时他已尝试作曲,从1942年至1944年,他自认为是“音乐创作儿童时期”,连续创作了七首艺术歌曲,其中他作词作曲的《春,你儿时时光》,在上世纪60年代还被他的好友、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著名作曲家沈亚威赞为“是首好歌”。1945年8月18日,朱践耳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军,成了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乐团的一员，与沈亚威及后来成为著名二胡演奏家和作曲家的严晓敏成了战友。在部队的大熔炉中,朱践耳不仅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而且作为文艺兵在音乐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创作了十首多鼓舞士气的军乐歌曲。1947年2月底他创作的《打得好》一歌被他称为“最初的代表作”，在部队传唱后，深得指战员们的喜爱和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先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专业作曲,后来又被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任专业作曲。尽管此时他作为大型创作片《伟大的土地改革》的配乐中创作了他早期的代表作——管弦乐《翻身的日子》，但是他还是觉得“乐思枯竭”，“甚至怀疑自己究竟还能否继续从事音乐创作”。他迫切需要进入正规系统的音乐学习。1954年幸运之星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国家选派到苏联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随谢尔盖·阿·巴拉萨良教授攻读交响乐创作专业。他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深造机会，也实现了他所崇敬的聂耳未完成的志愿,来到苏联留学。他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五年,从1955年到1960年的日日夜夜,他都勤奋刻苦地学好每一门课程,成绩优异。期间他创作了各种体裁的作品达二十一首之多,里面最有成就的作品首推他的留学毕业论文: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毛泽东诗词五首)。另有《节日序曲》、管弦乐《壮士行》、钢琴独奏《流水》和《思凡》等优秀作品。“交响梦”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在他心中抽枝展叶,茂盛成长。他少年时立志要走的音乐之路也越走越扎实。他的第一部专业性的有成就的乐队作品《节日序曲》于1959年被苏联国家广播电台看中,作为永久性曲目买来保存,还由苏联大剧院交响乐团演奏,可见朱践耳创作此曲的成功。他的留苏五年学习总结的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是他一部阶段性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他还在我国首创了“交响曲—大合唱”的音乐体裁。他的少年时的理想就是以后要“聂耳加贝多芬”,就是以西方的作曲技法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的交响乐作品。

1960年7月，朱践耳学成回国，怀揣交响梦，准备全身心投入交响乐创作。他原想到专演交响乐作品的上海交响乐团工

音乐家与他所表达的音樂之間的心向背，是听众关心的一个人文命题。2015年9月28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隆重地举行了朱践耳先生的《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两本新书出版的发布会，并演出了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一年后,2016年10月17日晚，上海交响乐团又演出了一场朱践耳作品音乐会。两天后，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第四次举办了朱先生作品的研讨会；两个月后,《上海音讯》在第二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详细情况。这次会上，爱乐者们向这位发布会发出了呼吁：必须确立朱践耳先生的卓越地位！这呼声，也许与朱先生生前已高和将人们围绕着他创作记述的《朱践耳创作回忆录》的问世不无关联。不过这呼声注定是微弱的，也许难以而逝。因为爱乐者们的呼吁并无具体指向，随风而散。应由哪个机构或部门来予以定论。

平心而论，自从朱老者的《创作回忆录》出版后，爱乐者就期待专业人士能对这部厚重之作有热烈的评论；或许对朱老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卓越地位的评价就在此中产生。然而期望并未如愿！直至历时一年半年后,今年3月底，这一片被寂静终于由杨燕迪先生的《谈朱践耳创作回忆录》见诸于《文汇报》的日报。杨认为：“朱”记录了朱老独一无二的心路历程”，“留下了朱老对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发展历史独一无二个人见证”，“更为音乐创作的实践与理论勾勒了独一无二的美学语言”。朱老的艺术作品，”代表

## 上海音讯

# 中国永放异彩的音乐巨星

靳益廷

作,可是阴错阳差,却把他分配到上海歌剧院,为舞蹈和舞剧做

些“打杂”性质的配乐作曲。他因不能学以致用,不能创作自己向往已久的交响乐作品而多年深深苦恼。到了“文革”后期的1975年,他才如愿以偿地调入上海交响乐团,成了驻团作曲家之一。他厚积薄发,开始在交响乐创作方面发力。朱践耳的创作都是真情流露的有感而发,他的创作都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年轻时以聂耳为榜样创作的歌曲,他在苏联留学创作的一批作品,莫不如此。他到上海交响乐团后,陆续创作了缅怀周恩来总理的弦乐合奏《怀念》,以“文革”中的烈士张志新为素材而创作的《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献身的勇士》。1980年5月,后一部作品在“上海之音”音乐节上,由著名指挥家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次年即在全国第二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中获排 name="2" 的“优秀奖”,1984年5月在莫斯科第二届国际音乐节上，此曲由非·依·格鲁宾夫柯指挥乌克兰国家功勋交响乐团演出及录音片,同时朱践耳还以诗意的笔触和优美的旋律,创作了以江南水乡为背景的无伴奏合唱套曲《绿油油的水乡》。

朱践耳历来主张音乐创作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要在深入生活中饱览祖国山河的气象万千,雄伟壮观,感受各族人民的思想风貌、甘苦悲欢,要向民间民族音乐学习,搜集当地的音乐素材,以此来升华自己的思想感情,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融合和创造性地运用来自民间的音乐元素。从59岁开始,他多次到贵州、云南、广西等地深入生活和采集民歌,先后创作了侧重于画意的交响曲《黔岭素描》和侧重于诗情的交响诗《纳西一奇》,还与好友张岭合作创作了二胡与管弦乐组曲《蝴蝶泉》。这三部作品也都是由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首演。三部以西南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吸收了当地民族音乐的素材,并加以交响化地衍变发展,呈现了丰富多彩、富有民族特色的幅幅风俗性画面,受到各方面的好评。1983年他的《黔岭素描》曾由瑞典广播交响乐团在斯德哥尔摩演出。

朱践耳音乐道路的终极目标,是创作具有中国气派和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交响曲。他是1985年开始创作大转型,矢志“衰年变法”。他要更加贴近生活,“要充分发挥作者的创作主体性,需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构思、独特的笔法”,这就是朱践耳在花甲之后“变法”的追求和实践。在具体创作时,他在继承贝多芬等古典作曲家音乐传统的同时,还向民间民族音乐学习,还向西方近现代作曲技法学习。他60多岁了,仍去上海音乐学院和年轻学生们一起坐在课堂里听教授授课,并认真记笔记。他听过多调性的系统分析;对法国现代作曲家梅西安的作曲分析;关于十二音无调性体系的系列讲座等课程,而后研究消化,以此充实从苏联留学获得的传统作曲技法,进而把学到的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异化到自己的具体创作之中。

从1985年到1998年的十多年里，朱践耳创作了十一部交响曲，几乎每年就有一部大型交响曲问世。他反思“文革”的第一和第二大交响曲是他“衰年变法”后最初的姐妹篇似的创作成果。时任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北京听了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的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后,握着他的手称赞说：“你写的很棒啊!”他的加了钢琴独奏的《第二交响曲》仍由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中国音乐家协会为之召开了座谈会,与会者都对此部交响曲作了高度赞誉。有位音乐理论家说:“和《第一交响曲》相比,《第二交响曲》更多的是由心地体验和抒发,揭示了人们精神上所受的磨难,用的是现代化语言。又一次证明,践耳的作品总是反映时代,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1986年朱践耳64岁,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到西藏深入生活和采风,历时一个多月。在西藏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高原反应,兴致勃勃地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几个藏族人民居住的地方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风情习惯,采集藏族民歌和藏族的音乐素材,感到在“世界屋脊”之上,“一切都那么新鲜神秘,那么兴奋迷人”。他的创作激情像雅鲁藏布江奔腾激荡起来,回沪后他很快写好了《第三交响曲“西藏”》,描绘了西藏多姿多彩的风俗性画面,展示了藏族人民豪迈爽朗的性格,他把此部交响曲称为“散文诗”的作品。

朱践耳在自己的交响曲创作中,并不追求固定的模式,而是

## 读《朱践耳创作回忆录》之联想

钱天华

童龄的忐忑不安。显然，朱老心中有一面镜子，也是他人处世、创作谱曲的原则。他既追求作品的伟大，又警惕自身的张扬。正是这样轻重、引以自鉴的。反复研读杨文时，朱老和他的作品奔来眼底，记忆犹新。

未料，此文发表还不到5个月，朱老竟撒手西去！人们在因他去世深感悲痛的同时，列举了许多感人的往事，来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怀念；许多好评人评价他的业绩。我在阅读对老者的悼念、回忆的文章时，觉得这些所言所述，几乎都是对杨燕迪先生上述三个“独一无二”及“最高水平”的论述所提供的详尽、具体的诠释。杨先生在朱老逝世后，又在《音乐周报》上发表了悼念文章，对朱老70年的创作，作了全面而又简练的陈述，点评。

然而，社会各界——尤其是音乐界，对先生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对中国音乐的贡献，特别是就杨燕迪先生对践耳先生的评价，似乎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說法。

朱老的智慧与品格，把自身的后事都安排得淡化似得伟大。他的自重、自省，在他的一个亲密的晚辈写的文章中反映得淋漓尽致。践耳先生的创作，（我写的）音乐像我吗？”这语气中几乎有

一个模样，从不重复自己，他要尝试用不同手法，创作每部挑战自己的各具个性特色的交响曲。他创作的《第四交响曲》（为笛子和22件弦乐而作的室内交响曲），就是由中国的竹笛和西方的弦乐器组成的作品，而且获得了第十五届瑞士“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银奖一大奖，这不仅是一位中国作曲家荣获此奖，也是亚洲首位东方人获此殊荣。

朱践耳是抗战老员，是老党员，但他从不以此作为政治资本，谋取官运亨通，即使在他花甲之年后担任了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和上海市文联主席，他也没有弃乐从仕,而是始终坚定地走音乐创作之路,全心全意为我国的交响乐事业的发展挥洒音符。他不是以音乐创作沽名钓誉，而是为填补我国交响创作的空白,是为我国交响乐能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舞台。因此在60岁以后,他爆发出更加旺盛、更加持久的创作热情。一部接一部新穎独特的交响曲闪亮面世。1994年1月,他和夫人群祥到美国探索,在实际的七个月中,他写出了《第六交响曲3Y》(为录音带和交响乐队而作);写出了《第七交响曲(天籟·地籁·人籁)》,这是一部为五位演奏者敲击50多件打击乐器而写的“敲击乐交响曲”;他还写出了一部用一把大提琴和一个人敲击16种打击乐器的“二人交响曲”——《第八交响曲“求索”》。同时他又创作了一部十分钟的用简明如歌的旋律,来表达深层思想感情的《小交响曲》,他接受了北京电台音乐部委托而写的《第九交响曲》晚于他的《第十交响曲》完成。1997年他接受美国哈佛大学朗音乐基金会委约,创作了《第十交响曲“江雪”》,他以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的意境和内含构思全曲,巧妙地把富一弹奏的古琴和高尚长的吟唱交织在交响乐队庞大的结构和丰富的音响中。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当年在北京听了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的《第十交响曲“江雪”》后,赞美地说此曲“是作曲家人格完成的重要作品,是我国交响曲领域中探索最成功的一首”。

令人赞颂的是,朱践耳几乎在奋力创作这些交响曲的同时,他还以充沛的精力和奔涌的灵感创作了庆贺香港回归的获颁一大奖的交响诗《百年沧桑》;创作了获上海文化艺术节优秀成果奖的唢呐协奏曲《天乐》;创作了获上海乐团为庆祝建国一百二十周年而委约的管弦乐《灯会》;创作了台湾省立交响乐团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委约的交响诗《山魂》,也在这同时,他还创作了十一首钢琴独奏、琵琶独奏、重奏、管弦乐组曲和女高音与弦乐四等作品。他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成果,在国内音乐界名列前茅,有口皆碑。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陆在易称朱践耳是“天才作曲家”,堪为名副其实。

朱践耳创作了十部熠熠生辉的交响曲，创作了数不胜数、获得中外赞誉的各種体裁的音乐作品,可谓著作等身,为我国的交响乐创作树立了一座令人敬仰、令人研习的高大里程碑。时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指挥本团首演了朱践耳的大多数的交响乐作品。他说从朱践耳身上“看到了一种浓浓的为人民服务和创作的情怀,让人敬重”。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黄晓和称“朱践耳就是跨越世纪的伟大作曲家”。他在《人民音乐》杂志发表长文评论朱践耳创作及其成就的结语中写道：“我认为他是一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直面现实,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作曲大师”,“他必将日益被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理解、肯定和爱戴”。曾与朱践耳建立多年交的深度友谊的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及其会员们,也大声呼吁:朱先生已经为我国交响乐事业作出如此多如此大的显著而重要的贡献，现在是必须确立他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卓越地位的时候了。

党和人民高度重视和评价朱践耳在音乐创作中取得的赫赫成就,他因此获得了许多奖项,可以说他是在我国交响乐创作中获奖最多的作曲家。其中有重量级的1991年获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个人杰出贡献奖,2003年获第三届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金钟奖”终身荣誉奖章,以及在中外各种作曲比赛和演出中获得的其他重要奖项。朱践耳一生埋头创作,低调处世。他说自己的创作只是为他人做一块铺路的石子，为年轻的作曲家提供自己创作的经验教训。去年他94岁时,在一封写给爱乐者的信里,他仍满腔热忱地寄希望于我国音乐界,他说：“为了中国的交响乐创作和演出高峰,努力吧!”朱践耳作为我国音乐界的一颗巨星,虽然陨落了,但他的辉煌人格、博大作品,在中外乐坛将永放异彩!

报》爱乐者协会对他“无声的爱”。是这些爱乐者支持他度过了最早运用现代技法创作作品的艰难时期。他说“中国作品刚刚起步,要赶超国际没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中国,我们更需要爱乐者,希望所有与中国作曲家工作者都能得到善待。”这肺腑之言与某些作曲家的“当代作品的现状,存在着先进的创作和落后的听众的矛盾”的说法迥然不同。还有,可能在朱老生前,仔细阅读他的《创作回忆录》的业内人士为数甚少,一些历史掌故(如某首作品的首演者等)未及确认,也未能听到先生对“赶超国际”——也许其含义不同于“走向世界”——予以阐述。也只能憾了!

他的“代表着中国交响乐创作至今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后人会何以为其,命运如何?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因此,我建议,鉴于朱先生的杰出贡献和标杆意义,在毗邻他长期工作和居住地的上海淮海西路三角花园的聂耳铜像旁,树立朱践耳先生的铜像,举力张扬践耳先生的精神,延续他的追求,出版面向普通读者略去大量乐谱的《朱践耳创作回忆录(平装本)》,以便更多人——特别是没有“文革”动乱年代的体验、不熟悉那些特殊音乐事件的后人——欣赏他的交响曲。每年举行一次场次的各类作品的公益音乐会,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

先生风范，山高水长！中国交响乐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朱践耳先生永垂不朽！

